

GAOCENGRENWUZISHU

高层人物



自述

中國古籍出版社

高层人物自述

主编 孙小金

第六卷

中国古籍出版社

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

国民政府建立的前夕

一九二五年五月间，我为了参加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逗留了一个月，有机会了解广州的政治情况，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的改组势在必行，但也因此种下以后多种纠纷的根源。

我在该年四月底到达广州，首先会见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他是陈独秀的长子，留法时期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回国，即任此职；为人老成练达，长于思考。我和他第一次会面，就觉得他比在北京工作的赵世炎历世较深。

他向我叙述广州的情况，指出广东方面自解决商团事变和东征胜利后，局势经已好转。但广州政府的政令尚不能通达全省，因各军防区制在作祟；其中尤以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控制着广州市区，包收烟赌税，无所不为。他对广东工农运动也不乐观；右派的机器总工会仍与左派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彼此对立；各县地主势力远较农民协会的力量为强大，地主们到处都筑有碉堡，拥有武装，农民协会被压迫的事层出不穷。

我接着去看当时广州政府最高负责人胡汉民；他在孙先生北上后以大本营秘书长身份，代理大元帅职务并兼任广东省长。他那时正患目疾，在我们一个多钟头的谈话中，始终没有深谈到广东的政治。我告诉他一些有关第二次劳动大会的情况，他曾允予协助。胡素喜高谈阔论，那天却不肯多谈政治，显出他似有郁抑之情。

当时中共中央一直将胡汉民视作中派的领袖，中共在广州的同志则多目他为右派。陈延年等曾向我指出，胡汉民在孙先生逝世后，即亟欲成为孙先生的正式继承人；但他政策右倾，拉拢一班落伍军人如杨希闵、刘震寰、范石生等以壮声势；同时与他接近的伍朝枢、古应芬、傅秉常等人则暗中向香港频送秋波。陈延年等不满意胡这种做法，认为江精卫、廖仲恺、蒋介石等人才是支持联俄容共的左派。

汪精卫那时挂着好几个委员的头衔，却没有担任实际职务。他对于解决杨刘和改组国民政府的事，表现得很积极。我和他会面的时候，他总摆出曾亲受孙先生遗命的样子，向我说了一套秉承总理遗志继续革命的话。我也在鲍罗庭的寓所遇见他好几次，他老是挟着一个皮包，来去匆匆，谈到具体问题，又有些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大计能否实现，还在未定之数之故。

当时负担广州财政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仲恺，是广州政府颇具实权的人，我和他接触较多。我们谈到第二次劳动大会的问题，他老是说他的秘书冯菊波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他自己则应允对这次大会予以财力的支持。他谈吐坦率亲切，私下告诉我，他在运用一些非常手段，征搜钱财以资助军需。并表示实在不忍坐视这种状态长期继续下去。

鲍罗庭在孙中山逝世后，权威日隆。他似是广东要人中最忙的一个，每天去见他的人很多，陈延年等因事去找鲍罗庭，也要等上一两个钟头。他的办公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面，我第一次去找他，也在他的秘书张太雷的办公室坐候了一阵，才见着他。

他向我指出广东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财政困难。要解决这个困难，必先统一广东；广东统一了，才能组织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统一财政：禁止军队官吏劫截税收，厉行节约，充实公库，分配务求合理公平；以期全部收入足敷革命所需。鲍罗庭还谈笑风生的说，他所提倡的是“廉洁政治”，认为这是符合革命意义，革命与反革命，左派与右派都由此判然立分，即贪污者往往是不革命的，而“廉洁”又是天经地义，无人能反对的。

鲍罗庭从不肯事先吐露他的具体计划，对我也不例外。几天后，张太雷才对我说明鲍罗庭此一方案的内容。鲍罗庭鉴于多数将领反对杨刘垄断财源，也不满意胡汉民的敷衍政策，因此，以统一财政为号召，秘密策划解决杨刘，杨刘解决以后，再行组织国民政府。这个解决杨刘的军事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但杨刘的军队盘据在广州市内，稍一不慎，天机泄露，杨刘就会先下手为强。

当时广州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它在落后与混乱的背景上，涂上了一层革命的彩色。长堤一带，烟馆赌馆林立，为滇桂军的税收财源所系。少数私人汽车多为军人所占有，往往载着军人或军眷，车上站着两个或四个武装士兵，在马路上急驶而过。当地出版的书刊仍多其有旧文学的风格，黄色的读物，尤占多数。这些落后情景，即在北方城市也不多见。但在街头巷尾随处有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十字街口往往横挂起白布条，上书大红字的动人口号；在熙熙攘攘的行人道上，也有些系着红领带的黄埔军人和穿着中山装的革命人物。工会和其他民众机构的门面，多装饰得彩色缤纷，与多数商店住户相较，倒有如天上繁星。这种浓厚的革命气氛，向为北方城市所少见。凡此前进与落后的情景，任何人一眼看去，都会觉得绝不调和。

中共广东区委会设在文德路一所楼房的二楼上，可以说是一个半公开的机关，门口没有招牌；中共广东区委会也从未将这个地址对外正式公布过，但知道这里就是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人却不少；所推行的种种活动，也似乎是公开的，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这是中共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唯一能公开活动的机构。它在广州市所有各革命机构中，也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一个。

这个办公处虽不算宽大，但来往的人是川流不息的；并且常有几种会议在里面同时举行。当时广州市的中共党员共约三百人；他们自然要经常到这里来接受训令。还有并非中共党员的工人们，为了工会的事务，也常出入其间。甚至有些国民党左派人物，也间或到这里来访问。中共广东区委会还设有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军事部，为中共中央尚未

设置的单位。农民运动委员会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负责，军事部由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负责。赤脚的农民和斜挂着皮带的军人也常在办公处出现。

但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效率并不算高，制度也颇混乱；这与办公地点狭隘，交通工具缺乏，气候炎热，设备简陋等等大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这里中共的负责人应付这个复杂的局势，究竟欠缺经验，又要尊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朝夕相处的鲍罗庭的意见；有时这两个上司的说法往往有出入。但一般说来，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成绩仍是不错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似是一个办理例行公事的机构；它外表固然远较中共广东区委会为堂皇，办事人员也多些；但工作并不显得紧张。我曾几次造访那里，也与那里的人员有些私人往来。我觉得他们多是奋发有为的人；有些也不安于这种办公室的生活。谭平山曾告诉我，他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也不过是办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重要的政策问题，由国民党少数要人与鲍罗庭商谈取决。至于一般的人事和工作问题，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工作的分配，多由中共广东区委会预先商定。因此，他自己只须根据这些商定来执行而已。

这种种现象使我深深感到在孙先生逝世后，广州竟没有了领导重心。由鲍罗庭来填补这个空缺，是不妥当的。我曾就这个问题与张太雷恳谈。他认为现在的情形，国民党失去了孙先生，由一个外国人来负实际领导责任，能发生平衡作用，不能算是一个坏现象。

我也曾访问当时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商谈广州军事问题。这位身材魁梧态度诚恳的军人，非常尊重中共中央的领导。他展开地图说明广东军队分布状况，向我暗示解决杨刘，在军事上是有把握的。他也说到解决杨刘以后，军事体系要实行改组，使某些可以改善的军队，都得到和黄埔一样的发展。他的这种意见与鲍罗庭侧重扶植黄埔的观点，是不尽相同的。

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会委员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却鼓吹广东军事应采“黄埔中心主义”。他于一九二四年由法国归国后，即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实上他一直担任政治部主任的职责。当时他随着蒋介石将军在潮汕一带工作。也曾跑回广州一趟来会我，表示对黄埔的前途极抱乐观。他和鲍罗庭相处无间，为鲍罗庭所奖掖，他们两人都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

原来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改组后第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成立黄埔军官学校，以为建立党军的摇篮。孙中山先生即派定曾于一九二三年赴苏俄考察军事的蒋介石将军为校长。正当筹备成立的时候，受命任校长的蒋介石突然离粤赴沪，表示辞职；戴季陶曾因此赶往上海挽留，蒋始返回广州就职。

蒋氏主持黄埔军校的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中，中共党员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占八十余人；蒋那时对他们一视同仁。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更具权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党员担任；由具有中共党籍的学生们所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也获得蒋氏的支持。

黄埔成立后，曾受到广东各军队的压迫。在解决商团的时候，握有实力的范石生军

长就曾以轻藐的态度向蒋介石说：“黄埔不是有新练成的党军吗？为什么不叫他们去打呢？”大概范认为新成立的党军人数很少，何能作战，因而要看看党军失败的笑话；然而事实上党军的这次行动是胜利了。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缴获的商团军械和由苏俄运来的军械都藏在黄埔的军械库里，各军将领曾要求将这些武器分发给他们，甚至风传他们将实行强抢，蒋氏曾督同全校学生，严密守护，以防万一。又广州政府的财源为各军所把持，黄埔经费一直短缺；幸有任党代表的廖仲恺为之多方罗掘，始能勉强维持。由于这种情势，使黄埔的全体师生，消除了国共界线而一致对外，成为一个新兴的不可侮的势力。

但这个新兴势力跟着就发生了裂痕。据黄埔政治部秘书聂荣臻告诉我，一九二四年春第一次东征时，黄埔教导第一团才成立三个月，人数不过一千多人，步枪只有八百余支，由何应钦任团长。教导第二团成立更晚，人数只八百多，说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当教导第一团在惠来地区与陈炯明部林虎师八个团的优势兵力相遭遇的时候，即陷入整日的苦战之中，那时蒋氏所亲率的教导第二团却在离前线六十里的地方，停留未进。加仑将军目击前线紧急，曾多次催促蒋校长率队迅速增援，而蒋氏却按兵未动。蒋氏当时兼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似是希冀许部粤军去应援，以避免教导第二团的牺牲。加仑将军则认为蒋氏不亲往策应，无异使教导第一团陷于被消灭的险境。

聂荣臻还眉飞色舞的叙述那次战役的英勇过程：教导第一团打了一个整天，连加仑将军等俄国顾问和他自己所率领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前线作战，终于一个接一个的冲破了林虎所部的阵地；迫使敌人于黄昏时向兴宁五华退却。但第一团也已打得筋疲力竭，伤亡达三百余人，连排级的干部都多数牺牲了；剩下的也是弱卒残兵，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这时加仑将军却振臂高呼，用宏亮的声音，向队伍演说号召他们鼓起余勇，乘胜追击，并大喊“教导第一团万岁！”“何应钦团长万岁！”正在加仑讲话的时候，蒋校长才带着第二团匆匆来到，颇有过意不去的样子，加仑将军不仅没有喊蒋校长万岁，并且面露不豫之色，接着队伍就乘夜出发追击去了。聂荣臻认为这件事不仅在蒋与加仑的关系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黄埔内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层阴影。

当时我们的想法，不仅在于打倒杨刘，尤其是要在打倒杨刘以后，防止再有拥兵自重的人，希望广东政府能从此打开一个新局面。我们中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有的和加仑一样主张要建立一种妥善的政治军事制度，不要以某个人或某一系派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多数则支持鲍罗庭，认为黄埔势力已颇具基础，不会中途变质，而且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空谈。

我曾为这些事和鲍罗庭多次商谈，所涉及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调整广东的领导关系问题；二是解决杨刘以后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鲍罗庭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并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

我曾告诉鲍罗庭，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磨擦。

根据中共中央暂时不可能搬来广州的这一事实，我建议鲍罗庭应与中共广东区委会建立一种共同领导的制度。其内容是鲍罗庭与广东区委会主要委员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等经常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并由广东区委会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中共中央。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广东区委会获得全盘领导的经验，在复杂的广东局势中，形成一个领导中心，而且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广东区委会之间的隔阂。

中共广东区委会陈延年等是赞成我的主张的。陈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鲍公馆，才能获得一鳞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鲍顾问的指示，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中共中央方面常觉得他们未将广东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其实，有些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如果有一个确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再有这些流弊了。

但鲍罗庭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虽口头应允照代所提的办法去做，但后来并未兑现；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像个“四不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的个人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不与他们事先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即使有时他与陈延年等举行会议，也不过是对于他的见解作必要的解释而已。

这时——列宁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日益尖锐，鲍罗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庭都是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而已。

鲍罗庭对国民政府的建立问题避免谈论。他曾向我指出，国民政府建立问题现在不能讨论，因为解决杨刘，国民党各方意见大体可以一致；如果在解决杨刘以前，就和他们谈到建立国民政府问题，可能引起内部的分化。再则他也不赞成中共中央就这问题预先有所拟议，因为这是要根据解决杨刘后的实况来决定的。

虽然如此，鲍罗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关于国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们谈到胡汉民的时候，他曾耸耸肩向我笑着说：“胡汉民吗？他有一点毛病，如果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他的亲信也便知道了；随着英国人也便知道了。这样，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这几句评语，表示他对胡并不信任，遇有机会，显然他是要贬抑胡的。

我们谈到汪精卫的时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谈。他说汪还是和在北京时一样的谦逊，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似却不会退缩。我们谈到廖仲恺，他叹息着说：“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他还指出廖愿多做些实际工作，却

不愿居领导地位。

鲍罗庭这些有关人事的话，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国民政府的轮廓；后来事实上也大致如此。我们还进而谈论到国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鲍罗庭表现得有些茫然，也许他那时是采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

他肯定的赞成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但他也指出委员制是利有弊的。委员会如果缺乏中心人物和实力来支持，那将一事无成。这些话预示他不相信委员会所包含的民主和联合战线等想法，一心在策划一个他所能领导的重心和更加扩张的黄埔实力，以便建立“革命的专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据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是要以党治国的；而根据孙先生的北上宣言和遗嘱，又是要召集国民会议的。这两者比较起来，中共中央自会赞成将未来的国民政府，建立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之上。我还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争取国民党中派分子的。并视胡汉民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至于他是否完全赞成联俄容共的政策，则不愿苛求。

鲍罗庭也认为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应俟解决杨刘之后，再作决定；并要求我在广州多留一些时候，以便随时商讨，我也答应了。后来因为顾正红被杀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赶回上海，因此，鲍罗庭关于建立国民政府的杰作，我虽已预知其梗概，但究没有直接参与的机会；即中共中央也因忙于指导五卅运动，对建立国民政府这个首要问题，也从未表示意见，一切都听由鲍罗庭去处理了。

革命阵容的分化

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反抗广州政府领导的西山会议派这时形成了。中共中央为了减轻国民党内部分裂对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主张争取国民党中派，以孤立右派；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这种政策又与鲍罗庭的所谓“革命专政”发生抵触。

我由广州回到上海后，曾将在广东所知道的情形及我与鲍罗庭商谈的经过报告中共中央。我也说到在我离开广州以前，鲍罗庭曾表示中共中央一时既不能迁来广州，我又马上要回上海去，那就只有信托他会同广东区委会相机处理一切。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全力应付五卅运动，对我的报告未详加讨论，就搁置下来了。

但探知国民党内部情的陈独秀先生表示忧虑。他认为胡汉民是中派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的正统，在党内的势力颇具根基；汪精卫不免软弱，虽有清誉，究无实力；如果硬将胡汉民从代帅的地位拉下来，是会出乱子的。他的看法虽然如此，不过当时鲍罗庭尚未明白表示，他的议论也没有进一步说下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许崇智所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所率的黄埔党军回师广州，于六月十三日解决了杨希闵、刘震寰这个心腹之患。据说这次战争进行很顺利，没有多少伤

亡，也没有甚么重大的破坏，甚至有人说是由于俄顾问亲手向杨刘总部发射了几炮，敌军就溃散了。

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五卅事件开始罢工，六月二十三日发生著名的沙基惨案。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更为左倾，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更在那里函谋发动全国的反帝力量，以支援广东。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反帝浪潮弥漫全国时悄悄的宣告成立了。中共中央仅于报纸上获知这个重要消息。国民政府委员会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组成的；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由代帅降为无事可做的外交部长。我们——中共中央首脑们——中曾有人认为现在的国民政府只能算是临时性质的，正式的国民政府应由国民会议产生；这似是无可奈何的说法，借以减轻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压力。

上海的国民党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改组，很快就表现出他们不赞同的态度。最初他们都表示不尽明白广东的内情。不久，国民政府委员的人选径在政治会议自行决定，而未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同时邹鲁、邓泽如等人又持反对态度，于是，消息一传到了上海，他们就议论纷纭了。如戴季陶就认为贬撤胡汉民是一件应该避免的事。

当时，国民党的对外宣传缺乏效率。广东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没有适当的报导。加之省港罢工后，广州与香港间的交通受到阻隔，直接来往广州上海间的船只极少；因此，广州的消息多是非正式的经由外国通讯社传发出来，其内容自多对广州当局不利。中共中央这时也以不能获得广东的正确消息为苦。

我们获知广东方面第一个不利消息，是加仑将军被调离广东。加仑将军是广东军事的支柱；而且是有过赫赫之功的。中共中央根据我的报告，认为这是鲍罗庭和加仑间发生歧见所致。后来据张太雷告诉我，果然是由于加仑主张支持许崇智为军事首脑，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而鲍罗庭则主张支持蒋介石；结果由莫斯科裁定，否定了加仑的意见。

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军校成立。据广东区委会的报告，孙文主义学会是专为对抗中共党员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设立的；其组成分子多系右倾学生，如一期生曾扩情、贺衷寒等。教官中则有甘乃光等为之策划；事先并得到汪精卫、廖仲恺等的同意。

这件事使我们大为不满；认为广东工作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毛病。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有人指出汪精卫、廖仲恺都是著名的左派，为何竟会同意组织与中共相对抗的孙文主义学会；很可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中共党员所包办，遇事又大出风头，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妒忌，因而亲共的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也不得不准许他们揽这个新组织。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事件震动了整个革命阵营。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广州局面的危机，显系右派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主张严厉镇压。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认为廖是国民党左派的真正重心，能团结汪蒋等人，不管在党员中、军人中和民众团体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很好的信誉，因此右派选中他来谋害，是要去掉眼中钉，取消联俄容共，进而根本破坏国共合作和国民政府。但我们也觉得镇压只能制止右派继续破坏，根本之图，还是要注重团结国民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为害，才能稳定革命的阵地。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根据鲍罗庭的提议，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任委员，负责处理廖案。从此，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也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转移到这个特别委员会手上了。而且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亲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杀廖的嫌疑，林直勉并因此被捕，胡汉民亦被软禁在黄埔。不久——十月二日胡并被派赴俄考察，实际等于放逐。

该年九月间，许崇智属下的郑润琦、莫雄等部队，涉嫌勾结陈炯明军，企图叛变，于同月二十日为蒋派军队包围缴械。许本人旋于二十三日辞职离粤；于是三人特别委员会再变为汪蒋合作的局面。

广东方面这些重要的变化，中共中央初因广东区委会缺少报告，并不详细知道其中内幕。而上海不少国民党人又纷纷谣传：这是中共分化和破坏国民党的行动；还有省港罢工委员会已成为第二政府；广州即将实行共产统治等等谣言。中共中央由于不明内情，苦于不能拿出反面事实加以辟谣。

直到九月间，胡汉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鲍罗庭方面的简单通知，说明为了稳定广东的政局，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已决定用国民党代表名义，派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留住胡汉民，不让他归国。我们看了这个通知，首先觉得鲍罗庭的用意，显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伤脑筋，他曾在中共中央会议席上表示，如果胡汉民真是刺廖的主谋者，就应在广州依法惩办；至少也要将他的阴谋公布出来，以揭穿他的真面目，否则就不应软禁他。现在鲍罗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将使共产国际难于处理。

同时广东区委会来的报告中，描述广东的情况，也和鲍罗庭一样，称汪蒋合作之局方“革命的专政”。这个报告也说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戴季陶那本题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在黄埔与一般国民党人士中，流行甚广，影响亦大，势将酿成新右派。广东省委否定国民党内有广大中派存在之说，要求中共只与国民党左派团结，共同推进革命向左发展。

鲍罗庭和广东区委会的这些观点，首先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强烈反应。他认为在广东的同志们忽视了整个反共阵线的力量；他们偏处广州一隅，企图以一部分革命军人、省港十几万罢工工人、和二十几万有组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般反共势力，显然是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

广东问题在中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有人讥讽所谓“革命的专政”是离开阶级观点的自我欺骗；有的说连胡汉民也无法处理。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还谈甚么“革命的专政”有的说如果在这个“革命的专政”的名词之下，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作风和中国的帝王思想以及军人骄横的恶习混为一体，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讨论的结果，认为无论广东发生了甚么事情，国民革命在基本上仍应建筑在广泛的民族战线，因而不能忽视民族统一战线和联络中派的策略；绝不能因为五卅运动和广州的种种事变而改变初衷。事实上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如果强调革命专政，无异与统一战线的策略背道而驰。同时，就中共中央立场说，广东的左派领导能否站稳，亦

端视乎能否实施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定。

这样，中共中央与广东同志之间，就有了重大的歧见。十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我个人因事留沪未参加），鉴于党员人数当时已发展到一万人，大家都强调应脱离国民党独立发展。陈独秀先生为了避免国共之间的磨擦更形尖锐，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面目，建议应等待适当时机才退出国民党，但为当时多数出席者所反对。一叶知秋，国共合作的前途，荆棘丛生，势在必然。会中还批评了中共广东区委会忽视自身独立发展，甚至不自觉的自视为国民党左派，应予纠正过来。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更表面化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张继、谢持、林森、居正、邹鲁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他们以多数中央执监委员的名义，通过七个重要议案：一、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二、鲍罗庭顾问解聘；三、开除汪兆铭党籍；四、决定国民党此后对苏俄的态度；五、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李大钊等；六、取消政治会议；七、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

在西山会议举行以前，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通告全国，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山会议之举行似是有意与广州唱对台戏。而且他们散布“联蒋倒汪”的说法，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言论，也是尊蒋抑汪的；这对于汪蒋合作之局，可能引起分化的作用。

中共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急起商讨挽救方策。我们根据所知道的情况，认为西山会议派的活动，将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广州现在的局面可能因而垮台。西山会议派中也有一些中派人物，他们不愿广州革命局面的摧毁。因而我们决定采取具体步骤，争取他们，来分化西山会议派。

由于陈独秀先生的主动，并获得威金斯基的协助，我们约好孙科、叶楚伦、邵元冲在外白渡桥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三位先生或多或少与西山会议有关系，我们视为当时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中共中央方面则由陈独秀、蔡和森和我三人为代表。

那天上午九时，我们六个人都如约到达，围坐在领事馆楼下的大客厅里。领事馆职员没有出面招待，更没有人参加会议。我们见面时，仍和平常一样，互相寒暄，气氛却有些严肃。没有人谈到广东、上海、西山等地最近发生的事情，大致都很谨慎，避免说惹起是非的话。

会谈开始，先由陈独秀先生发言，他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中共主张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员来负责。至于广东方面的情形，事实上并不如外间所谣传，要排斥某些人士参加；广东负责当局希望各位先生能步调一致，担负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各项责任。陈表示了上述态度之后，进而征询他们的意见。

孙科、叶楚伦、邵元冲相继发表简单的声明。主旨是他们爱护广东的一切，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去广东参加大会。

于是，双方在悬谈解释之下，达成了七点协议。内容大致是：号召团结，在孙先生

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之下，大家都应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等。这七条协议经双方一致同意签字；至于若干具体问题，双方都认为应由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解决，不愿详加计议，以免节外生枝。

此次会议有良好的效果，虽然有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顽固分子斥之为“对中共的妥协”，但多数国民党人确因而改变态度，不再强调广州政府实行共产统治，为中共所包办等等论调了。大家要求团结一致，共维广州的革命局面。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企图，似因此而给阻滞了。

中共中央是认真执行协议的。曾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党员训示，并决定派我到广州去，代表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已往过左的偏差。此一亟谋中共独立发展不多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的新政策，始终获得威金斯基的支持。他声明在中共仍留在国民党内的不变政策之下，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是赞成联络中派，分化右派这些措施的。

国共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总是反复议论，常感进退两难。根本问题是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抑或趁早退出，改采党外合作的政策。在这根本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意见又不完全一致。我们中的多数确认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利，但也不能提出一致的改弦更张的具体办法，瞿秋白和别人一样对国共合作前途不表乐观，但常为共产国际及鲍罗庭辩护，更不赞成立即退出国民党。

当我受命派赴广州传达中共中央的意旨时，我曾中共中央会议上慎重提出要决定最后是否退出国民党。当时威金斯基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旨，坚持中共仍应留在国民党，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因不愿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而且时机迫促，也不容许我们作根本的改弦更张，只好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的政策，较之鲍罗庭所执行的，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结果，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我们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处处被动，只有听任国民党的实力派，用强制手段来摆布了。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洋溢着使人乐观的左倾气氛，但事实上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固然是汪精卫领导作风的特色，也是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汪精卫等三方面意见不一致，而又不能获得适当的调协，有以致之。

我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由上海乘轮绕过香港，直达广州（因省港罢工海轮不停香港）。我为了获得鲍罗庭的谅解，首先找他恳谈。他已知道了一些上海的消息，颇为不满。我将中共中央关于广州政策的决定和与国民党中派人物孙科等会谈的经过通知他；并且表示中共中央和我自己都认为应当首先和他交换意见，如果他赞成这些决定，据以对广州的现行政策有所修正，也应由他采取主动；我自己则不拟直接向外有所表

示；以免予人以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之感。

鲍罗庭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甚大的反感。他说到广东在过去半年中，经历了一场艰苦的奋斗；如非他和广州的同志们紧急应变，也许革命早就夭折了。他接着质问我：“为甚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他要求让他考虑几天再行讨论；但对我这次先和他商谈的步骤却表示欣慰。

鲍罗庭虽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策及据此所采取的行动，但似觉得这是威金斯基，甚至共产国际所支持的政策，不能等闲视之。他表示要先问明莫斯科和加拉罕的意向，才能作其体决定。他对已往没有将广东情况详细报告中共中央，并承认对外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力，以致引起隔阂一点，表示歉意。我答应他先了解广东实况，过几天再行讨论。

当时广东局势的演变千头万绪，要在几天之内获得全面了解，谈何容易。中共广东区委各负责人虽大都抱乐观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认当前局势潜伏着的危机。他们所谈的要点，大致如左：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是革命与反革命流血斗争的重要讯号。广东的中共同志，认为廖案的发生，不外两种因素：一是亲共与反共之争；二是国民党内部权利之争，无论如何，这表现了中国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养，动辄以暗杀手段对付反对者。

廖的被刺，胡汉民派涉嫌最大。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杨刘问题解决后，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因而失势。廖仲恺当时是扮演着“梁山泊豹子头林冲”的角色，支持汪精卫接替胡汉民负最高责任。廖系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与鲍罗庭以及中共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在厉行财政统一政策之下，开罪了一些与胡有关系的右派官僚。不少中共同志认为胡汉民本人及其亲信那时仍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大家都要求一致对外。但胡派居然刺杀多年战友，动摇了广东政府的基础，这是不能宽恕的。

廖案发生后广州骤然进入恐怖状态，广州要人中除谭平山、苏兆征仍照常在群众中露面外，其余的人无不草木皆兵之感；汪精卫并曾劝告谭平山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时鲍罗庭却力持镇静，提出组织三人特别委员会，局势才安定下来。

他们说到许崇智部之被整编，是因为许部分子复杂，其中高级将领缺乏明确原则与立场；有些有军阀思想，有些与胡派接近，至于指其与陈炯明勾结，则系莫须有的罪名。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后起的蒋介石勇谋扩充实力，借此机会，将许部改编隶其麾下；由此确立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十月间，广州局势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更形稳定了。当时重占东江惠州一带的陈炯明部，向广州进逼；南路邓本殷部进攻广州附近江门；中山县又为土匪袁带部所盘据。这些意图倾覆国民政府的反革命军事进攻，多有香港的奥援。香港当局那时是用“以华制华”的方法，对付反英中心的广州。蒋介石将军率部再度东征，消灭了陈炯明部。朱培德、李济琛、陈铭枢等部也肃清了邓本殷和袁带的叛乱。涉嫌勾结陈炯明的熊克武

部又为谭延闿、朱培德解除武装。由于这些军事胜利，广东算是统一了（只琼崖一带尚有邓本殷的残部）。

这是广东多年动乱以来第一次的统一，国民党人额手称庆之余，总常常向我津津乐道广东当时的局势。军队已编成了六个国民革命军，统由军事委员会指挥；国民政府的政令已能通达全省；税收月有增加，外交方面也有收获；国民革命的基础，可以说是奠定了。广州的中共同志也同样欣慰有加，觉得中共所领导的工农群众，曾在统一广东的工作上有过重大贡献；而且认为这是鲍罗庭政策的成功。

国民革命势力虽在扩展之中，但国共关系仍是一棘手问题。最明显的，是黄埔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加入前者的黄埔学生多系政治工作人员，其领导分子多具有中共党籍，绝大部分左倾。后者的成员则多系国民党籍的军官，领导分子多持坚决的反共态度，又在黄埔以外发展组织，如广州大学的孙文主义学会自命为“斯梯克”党，显然是要用暴力手段，对付共产分子。

陈延年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组成和扩大，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工作不力大有关系。青年军人联合会最初想包括全体黄埔学生，来对付黄埔以外的旧式军人；并且也得到蒋校长的支持。后来，这个组织在中共党员领导之下，发生了左倾的偏差，征求会员严加限制，有些黄埔学生没有加入，甚至有些申请加入者，竟未获得批准。这就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籍的学生的反感。陈延年又表示，孙文主义学会气焰如此高涨，背后也似获得蒋校长的支持。

戴季陶那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似是孙文主义学会的经典。陈延年告诉我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送给鲍罗庭看，鲍罗庭表示戴季陶站在国民党立场说话，未可厚非；鲍并指出他对甚么事都有办法，只有解决国共纠纷他无能为力。因而陈延年除了指斥戴季陶和孙文主义学会为新右派之外，别无他法。

我听了陈延年上述这些话，不免有点生气。我指出鲍罗庭所说的是废话，解决国共纠纷为根本之途，对此问题无能为力则一切都属空谈。我还反问他：“鲍罗庭这种避免接触根本问题，以不了了之的手段来拖延，是否由于对共产国际将国共两党混为一体的政策，根本失去了信心之故！”陈延年默不做声，似不愿参加讨论，但认为要想出办法来。

另一方面，中共正领导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一个声势赫赫的庞大组织；数以万计的罢工工人正集居在广州市那些被封闭的烟馆赌馆旧址里和一些公共建筑物内。委员会除干事局等正常的机构外，还设有会审处，审判破坏罢工、偷运粮食接济香港和私卖敌货的犯人；同时附设有监狱；对于敌货的处理，设有拍卖处。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水陆侦缉队的组织，拥有队员二千余人，步枪四百余支，小艇十二艘；他们分驻各港口，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此外还有法制局筑路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做法自然多方侵越了政府的职权。

当时在广州的中共同志，多以能领导罢工机构而自傲；觉得较之一九一七年俄国工人苏维埃还更有效率；但确没有取国民政府而代之的企图。国民党右派人物却斥之为“第二政府”，认为它包藏着中共在广州实行共产制的野心。中共中央则本着国共合作、

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意向，亟谋对罢工委员会的活动有所调整。

我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与广州同志商讨这个问题。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向香港所提出的条件分为两大纲要：第一是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沪案所提出的十七条；第二是直接针对香港的六项要求。即：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低房租；六、居住自由等。我指出应依形势变化降低要求条件，与香港当局协商解决，尽早结束这次罢工。如果罢工结束，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也就不必要了。所谓“第二政府”之说，也可不攻自破。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主持委员会的中共党员邓中夏等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他们都说香港方面始终对协商解决罢工一事，没有明确的表示。如果香港方面真愿意协商，他们随时准备谈判。自然，在条件方面也预备作若干让步。

他们还进而指出，由于省港罢工，加上罢工工人纠察队检查各港口，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不特使香港遭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使广东的叛军，得不到外力的支援；而且由于罢工工人参加了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支援作战和杜塞走私以裕税收等工作，更使广州革命政权日形巩固。因此，国民政府当局多认为罢工是有利的，即反对罢工的人，也只能说罢工委员会权力太大，却不能抹煞它对革命的贡献。罢工工人方面以曾获得政府和私人大批的捐款，生活也相当安定。不过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也得不到外货的供应，有些地方颇感不便；商人也受到损失；农民的农产品，无法出口销售，这些事都曾引起反感。

因此，九月初即实行出入口“特许证”办法。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的船货，可准其直来广州”。特许证规定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广东省政府商务厅公安局会同罢工委员会共同签字发出。这个办法实行以后，美日等国的商船相继要求领证直航广州。于是，上海广州间和暹罗广州间等航线，逐渐恢复。广州江面每日出入口船只多至四十余艘。这个办法在“孤立英国”，“增加政府税收”，“工商联合”，“工农联合”，“安定人心”等方面，都收到很大的效果。

其次，是农民协会与各地方政府和地主之间的纠纷。在发展中的农民协会，常因减租减息和一些其他的经济问题与地主发生争执；尤其重要的是农民协会属下的农民自卫队与各县地主所领导的民团，发生武装冲突。不是农民自卫队围攻地主的碉堡，便是民团杀害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各县政府处理这些纠纷事件，多偏袒地主方面；也常指斥农民协会简直成为第二政府，侵犯了各县政府的职权。

当时任广东省民政厅长的古应芬，或明或暗的支持各县地主民团势力。广东的中共同志将他视作眼中钉，认为非去掉这个右派古应芬，农民是不能翻身的。但张太雷告诉我，鲍罗庭近来也学得圆滑了；对古应芬支持反动分子事不愿过问。张太雷认为鲍顾问不说话，农村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可是鲍又似觉力有未逮，不愿卷入漩涡。因此，国民政府对农村既无一致的政策，若干乡村便成了两派势力的比武场所。

我原约定与鲍罗庭在几天后商谈双方歧见问题。鲍罗庭似也已得到莫斯科方面的复电，可以表示意见了。因而由他主动约集我和广东区委会主要负责人陈延年等举行会议。

鲍罗庭首先发言，他对广东局面表示乐观。指出在对外关系方面，由于罢工委员会组织的严密，香港方面一切破坏的阴谋都没有成功。他预料香港当局不久将与广州当局谈判解决罢工问题；有恢复双方正常关系的可能。至于其他各国，如美、日等国的商船，早已直接开到广州，进行经常贸易；而且日本方面开始与国民政府商谈海南岛田独镇铁矿开采问题，国民政府并准备给予开采权。根据这些情况，他指出列强现在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业已稳固这一事实。

关于广东内部的状况，他认为基本上已经统一，不会再有叛乱发生；汪蒋合作的局面也不会因外间的挑拨，而产生破裂。广西军人对国民政府的关系正在改善之中，可望成为国民政府属下的另一省区。广东四周并没有甚么军事力量，足以危害广东的安全。现在政府税收月有增加，并可望大量增溢。他认为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民政的整理、各军训练等主要工作，都可望顺利进行。

根据这种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他指斥中共中央“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是死板的公式。国民党左派本身是相当脆弱的，需要和中共合拢一块，才能形成一个雄厚的力量。他也承认摇摆不定的中派占多数，但反对以向右派让步的方式，去联络中派。他主张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无条件的拥护国民政府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他讥讽中共中央与孙科、叶楚伦、邵元冲等所成立的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

他还进而号召广州的中共同志，反抗上级的决定。他说不应当无疑间的遵守中共中央的决定。广东区委会负责人根据他们对广东情况的真实了解，是可以对这种决定，提出修改的意见的。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这篇演说漏洞颇多，立即加以答辩。我首先承认广东的局势是稳定了，也说到中共中央并不抹煞广东同志促成这一局势的功劳；但对前途的展望不如在广东的同志这样的乐观。就是根据我这几天的考察，也证明广东内部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我指出中共中央与孙科等中派所取得的协议是合理与必要的；因为联络中派以揽垮西山会议派的组织，就是向右派势力进攻的一个主要方法。我曾反问鲍罗庭，除了这种分化的办法以外，所谓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为一体的说法，是否含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应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包办国民党中央委员席位的意义在内？所谓强迫中派追随左派和进攻右派的说法，又应如何实行？

我的这些问题都是鲍罗庭难于置答的。因而我更说明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中共党员还没有任高级军官的，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多系负担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视为军中的附属品，未能直接掌握军队。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接着我要求在广州的同志们不要将中共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认识到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

行。而且在这次（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中，我们应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不要老是以革命的非常手段来处理问题。最低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便不受外间挑拨的影响。

我还提出了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消除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状态；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为一；二是应主动的谋求省港罢工的结束；如果罢工委员会一时不能结束，也应在国民政府法律范围内活动；三是我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更明确的政策，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改组各地地主民团的武装，使之成为各地地方政府的或农民的武装，以清除各地的武装冲突，并满足农民减租减息的经济要求。

我曾向鲍罗庭说：“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么真正的革命进攻；如果能实现我上面所说的各点，特别是使农民势力在乡村中居于优势，才是实际的革命进攻。”

鲍罗庭并未答复我的问题。广东区委同志们似不愿卷入我和鲍罗庭之间的辩论，没有人多发言，就散会了。事实证明广东区委的多数负责同志是站在鲍罗庭一边的；他们尤其反对中共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他们虽不视我为退让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甚至觉得我多少对广东情况有所了解，并寄予同情的人。但总感觉我的意见，含有退让的气味。

张太雷向我所说的话，似刻画出鲍罗庭当时的处境。他指出鲍罗庭在这里与汪蒋等人一同奋斗，相处得水乳交融；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鲍才能平息国民党内部可能发生的矛盾，稳定现有的领导。不过近来鲍罗庭精神上颇感不安，在处理广东各项问题上，往往遭遇困难，又被右派所反对；而莫斯科和这里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现在中共中央的决定更使其大伤脑筋。他还进而说到鲍罗庭在这里花了两年工夫，才把广东的情形摸清楚，如果莫斯科要另找个人来接替这个顾问职务，是很难有适当人选的。

我曾向张太雷保证，中共中央并没有要撤换鲍罗庭的意思。我自己来广州一切首先就商于他，也是为了尊重他。中共和孙、叶、邵等人的协议，也强调要他们遵守孙先生联俄容共的既定政策。这些似乎都不致使鲍产生不安于位之感。但张太雷仍感不满足。他指出西山会议公然开除鲍罗庭、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因此，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首先来一个示威性的反击；其中一项是应造成热烈拥护鲍顾问和汪蒋领导的气氛。他认为只空洞要求中派遵守孙先生的既定政策，而不具体的要求他们拥护广州现有的领导，是十分不够的。

这时，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而中共对此所应持的政策，我们——中共中央与鲍罗庭及广东区委会之间——迄未取得协议。在中共中央方面，既已与国民党中派有所协议，自不能中途变更。在鲍罗庭方面，又认为这是退让，须予修正；而在时间上又已不容许往复协商。我这个当事者处在夹缝中，只有使这种歧见不过份暴露于外而已。

孙文主义学会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速解决。但陈延年等总觉得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中合法而又成立较早的组织，而孙文主义学会却是未经正式许可的新右派的产物；如